

图书分类法的路向

杜定友

1876年《杜威十进法》出版后，1891年克脱氏发表《开展法》，1901年有《国会法》，当时被称为三大分类法。二十世纪初期又发表了新的三大分类法：1906年《勃朗氏主题分类法》，1910年《比列士书目分类法》和1933年《阮岡纳赞号分类法》。我国新型的图书分类表，1956年起草至1957年出版，稿經三易，实用后，发现问题不少。1960年进行大型表的编制，自J字以下类次改动了，又影响全局。《杜威法》初版仅42页，至1942年第14版增为1927页，1952年第15版减为872页，1958年第16版又增至2439页。在图书馆学上，其他各类图书都没有增修十几版的，只有分类法是这样，一版又一版，一法又一法，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欧洲各国图书馆采用分类目录是历史传统，但近来各大图书馆的分类目录都增附了类目索引卡片，以便读者可以依着类目名称字顺找到类码后，再去找分类目录。而科学图书馆和大型综合性图书馆的科技图书部分，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研究上趋向于综合利用自然，新兴科目分隶为难，纷纷进行主题目录的编制。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藏书的根本大法，百年大计，而至今还没有一套办法可以完全满足读者的要求，充分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图书分类法当前的严重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上反映了飞快的发展，作为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图书分类法，还是老一套的什么系统性等级性，怎能不落在时代的后头呢？现在的图书分类表，非但不能适应目前波动复杂的局面，而且给图书馆业务带来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那么，是不是取消图书分类法呢？不是的。我们要图书分类法为我们服务得更好。这就关系到今后图书分类法的路向问题。

图书分类法以科学分类法为基础，反映了客观现象运动形态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而各个客观现象又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因此分类法把各门科学在一

定的思想体系之下，系统地序列出来，这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无数的类目归纳起来，以便组织藏书为读者服务。因此，图书分类法的问题不在应否采取系统序列的形式，而在系统序列的深入程度和实用价值。分类法的问题在于盲目地依照科学系统，分到十七、八级。大型表如果没有类目索引，则类目的从属关系，分类员自己也摸不清楚，叫读者怎样去查找呢？《杜威法》第14版太详了，第15版马上减少，但16版又加详了，这样或详或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因为分类法本身存在着问题，不单在类目的详略和安排的位次上。

比如：宗教在基本序列中，以前是自成一类，说是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现在又把宗教大类取消了，附入哲学类内，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从前以宗教列在社会科学之末，说宗教是“衰颓的被批判的对象”，为什么现在又“提升”到最高级上层建筑——哲学里呢？以宗教列入哲学，说是它与唯心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与唯心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不列在哲学里呢？这样，把类目搬来搬去，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这套“大道理”读者是不感兴趣的，他只要找一本《佛教史》或《金刚经》看看。宗教的位次，分类表的编者自己还闹不清，所以说，分类表是“被迫使用”的。我们这样编，读者只得这样找。问题就出在这里。

宗教在科学系统上应有其本身的客观的位次。我们的分类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根据。毛主席说：“哲学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现在把宗教作为哲学的属类，它当得起“概括和总结”吗？哲学以“一般规律性”为研究对象，宗教是“一般规律性”的科学吗？宗教与唯心论有关，并不等于宗教就是哲学里面的一个部门。恩格斯说：“最高秩序的思想体系，距离经济基础最远，则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宗教与哲学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不是同一件东西。以宗教和唯心论有关而列入哲学类内，是没有根据的。这并不是宗教一类的问题，而是类目的组织不是编者可以任意

調出調入，而“自圓其說”的，必須求之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就是分類法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據的理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只有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能為群眾所了解。

圖書分類表是讀者群眾查閱圖書的工具。圖書館的任務在滿足讀者的要求，通過分類目錄很快地找到讀者所需要的圖書。研究半導體的學者，他需要占有所有關於半導體的材料，而且要馬上找到它。他不會考慮到半導體在科學系統上是屬於第幾級，是自然科學還是應用技術？因此，在分類表的編制上，斤斤於等級性、系統性，分辨什麼“以理論為主，以技術為主”，對讀者來說，是“不急之務”。

分類法好比是容納圖書的框框，框框是有一定的容量的，由於近代科學的勃興，出版的鼎盛，有時框框被塞滿了，框框是搭在一定的架子上的，而架子則有一定的結構。但由於近代社會的變化，邊緣科學和尖端科學的發明，這個架子已有“頭重腳輕”的現象，使“危樓欲墮”，而科學出版上的“奇峰突出”，這個架子已有些支撐不住了。圖書分類法所面臨的局面，就是這樣。

圖書分類表是為讀者找書便利而編的，但我們所編的表是帶有號碼的科目一覽表，而不是圖書分類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編表的時候，“心中無書”，“心中無讀者”。所以分類表編好後，一拿出來接觸到圖書和讀者，就發生問題。比如：在編語言學類的時候，我們就埋頭照抄語言學教科書里的語言系統表，一一配以號碼，分什麼南亞語系、南印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烏戈爾語系。讀者想找一本緬甸語，在什麼系呢？分類員拿到一本印尼語教科書，它是南亞語系，還是南島語系呢？表上列了四百多種語言，它們的從屬關係都是陌生的。找起來，非從頭找起不可。這是便利嗎？如果心中有書，心中有讀者的話，就該到圖書館去看看：有多少語言學書？有哪些類型？語言學書一般是怎樣寫法的？讀者所經常借閱的是哪些語言學書？以哪幾種語言為多？再查查世界上各種書目關於語言學書怎樣分類？再看看一般學校所教、廣大讀者所學是哪幾種語言？圖書館所藏的語言學書以哪幾國語言為最多？因為我們是在處理圖書，而不是在編語言的系統表。我們不能要求讀者先行學習了全部科

學體系才去找書，不能“強迫”讀者了解了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西部語支之後，才可找到一本俄語教科書。我們要求一個更直接更簡便的方法。

主題目錄是比較直接找書的方法。找俄語的，就找“俄”字。不過，各門科學不是孤立的。俄語和其他外國語也有一定的聯繫。但在主題目錄里，俄語排在E字，英語排在Y字，這在研究上也是不便利的。主題目錄也有一定的缺點。

由於分類目錄與主題目錄都存在着問題，就出現了二種新的方法：活動分類系統和分類主題目錄。

分類法的架子是定型的，而架子的結構是受到標記符號的約制的。必須擺脫這個“桎梏”，分類法才能自由活動，以適應迅捷萬變的社會和科學的發展。活動分類系統就不為標記符號所限。類號只作為排卡之用，沒有等級性和號碼長短的拘束。類目可以隨時增加減少。調上調下，只要把卡片重新組織安排，而不影響書碼和排架制度。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類目的新增和調動的問題。

分類主題目錄把全部目錄卡片，分為若干大類，一般是10—20類，同類的照類目字順排列，而沒有從屬關係，比如：自然科學類的物理學依“物”字排，化學依“化”字排。化學類的細目也是這樣。新興科目可以在大類之下，隨時加插進去。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編者易編，找者易找。

這二個方法都以固定排架法為條件。但在我國圖書館的情況下，一般都沒有超過二百萬冊，沒有採用固定排架法之必要。固定排架法不能在書架上直接找書，對於科學研究是有妨礙的。因此，活動分類系統難於採用，而分類主題目錄又失之太寬。化學與物理有一定的發展過程。化學的無機與有機也有一定的聯繫。一律照字順排列，也是有困難的。

分類主題目錄如果能保持基本類與基本類進一步細分（即三級類）的體系，書架上也維持一定的系統排列，那麼分類主題目錄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因此，分類問題實有從新考慮之必要。分類系統的深入程度應有一定的限度。從前那樣分到十七、八級，我認為是需要放棄的。細類號碼全被訂死，以至新增門類無法安插，也應設法予以補救，保證分類表有充分擴張的可能性。旧表所謂具有無限擴張的可能性，除了留空號碼外，實際上是細分的可能性而不是安插新增門類的可能性。留空的號碼位次，不一定適合新增的門類；一旦號碼填滿，擴張

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分类表的一再修改，其原因在此。

查1949—1954年全国总书目著录了动物畜牧兽医的书338种，其中总论性的（即一书包括各种动物或专论方法技术的）有212种，关于个别动物的（即一本书讲一种动物的）有126种（约占三分之一强），而后者里面关于牛、猪、羊、鸡、马、兔六种动物的书占161种，而骆驼、猴、虎等八种动物只有书25种。这虽然是局部的统计，也可以看出动物学书的一般情况。但分类表按照科学系统，由原生动物开始，分开门纲目科，列了好几百种动物，把牛分入第七级（Q793.424），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大部分的号码是挂空的，不会有许多书，而重要的生产资料每一本都带上七位号码，使工作上发

生困难。把动物细分作什么原兽亚纲、真兽亚纲、啮齿目、偶蹄目，一般读者是不了解的。如果把动物分为“鸟、兽、虫、鱼”四大类，每类依动物名称组织目录卡片，图书馆藏有哪几种就排几种，读者要找“牛”的，就在兽类中找“牛”字，不是直接了当吗？我们从前为分类而分类，罗列了大綱小目，连篇累牍，拖长号码，浪费篇幅，增加了编类、辨类、归类的困难，延长了图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我个人认为，分类法必须简化，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利用字顺排列法，走向新型的分类主题目录的发展道路。如果还是老一套的作法，即使化千人之力求编出表来，也不可能逃避旧表的命运：刚出版，又要改了。

纪念我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 北京、首都两馆举办展览讲演等活动

为纪念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北京图书馆前特举办杜甫著作展览，并与首都图书馆合办了两次讲演会。

杜甫著作展览，首先配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杜甫诞辰纪念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展出，会后即移回本馆展览。

杜甫的著作，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但已残缺不全。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经王洙广事搜罗，就秘府所藏和民间所传的杜集，除其重复，汇编为二十卷。到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州郡守王洙，得王洙家藏本及当时各本，参考校订，遂藏版传世，自此以后，继有补遗、增校、注释、批点之作，刊印的虽不少，但现在流傳的却不甚普及。

建国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杜甫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十分重视，不断地印行了影印本、排印本的杜诗全集、选集、新释和研究杜甫的著作。此外，在亚洲如日本、朝鲜，于十四、十五世纪即刊印过杜集。在兄弟国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版了杜诗选译和研究的作品。

北京图书馆展出的，是就該馆所藏各种版本的杜集和研究杜甫著作的一部分。其中有宋元以来珍贵版本的杜集书影和较重要的刻本，还有建国以来出版的影印宋本和各

种排印本，以及研究杜诗和杜甫生平传记等著作。国外出版的杜诗译文，也展出了一部分。配合展出的还有杜甫故乡——今河南省巩县瑞鸾村；杜甫曾经游历过的济南历下亭、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四川古剑门关等地方，以及成都杜甫草堂遗迹，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观杜甫草堂和为草堂题字的图片摄影等。

北京、首都两馆为纪念杜甫合办的第一次讲演会，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吴小如同志以《学习杜诗的初步体会》为题，就杜甫的某些诗篇作了分析，探讨了杜甫的时代背景，和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阐述了杜甫的虚心学习和写作的严肃态度。在这次讲演会上，邀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董行佶、梁雷、苏民三同志分别朗诵了杜诗《羌村三首》《洗兵马》《新安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七篇名作。同时还编印了杜甫诗选三十首和杜集及研究杜甫参考书目的小册子，当场分送给参加讲演会的读者。

第二次讲演会由《杜甫研究》的作者山东大学文学系肖滢副教授主讲，讲题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首先介绍了杜诗的卓越成就，次就某些诗篇的艺术特点作了概括的阐发，并对某些具体的篇章和诗句提出了新的见解。在讲演会后放映了为纪念杜甫拍摄的纪录影片《诗人杜甫》。

（仲筵）